

# 长期结构性困境下的“安倍经济景气”

## ——日本经济的幻象与事实

刘 瑞

[内容提要]在日本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进程中,面对经济低迷和长期通缩的困境,安倍在第二次组阁后提出“经济优先”的口号,相继推出以旧三支箭和新三支箭为中心的“安倍经济学”。2012年12月起,日本经济进入战后第16个循环周期,截至2017年6月,持续时间已超过泡沫经济时期的51个月,处于战后第三长的经济复苏期。“安倍经济景气”主要表现为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强力刺激下的经济回升,国民称其为“无实感”的景气扩张。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长期经济风险及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普遍存在的长期结构性难题。“安倍经济学”实施已近5年,其政策效果接近极限,如果结构性改革不能落到实处,日本新一轮经济复苏更多地只是一种幻象。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长期停滞论 少子老龄化 潜在增长率 长期通缩

2017年6月,日本内阁府景气动向指数研究会指出,从2012年12月起,日本经济进入第16个经济周期扩张期,到2017年3月,扩张期的时长超过泡沫经济景气时期,为战后日本第三长的经济复苏期,若持续至2017年9月,则极有可能超过高度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sup>①</sup>,跃居历史第二位。<sup>②</sup>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长期停滞论”被再次提起并引起广泛讨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受困于长期结构性难题中。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经济如此长时期的复苏局面令人关

注。本文首先将厘清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在此基础上分析“安倍经济学”的举措、效果及风险,以此展现日本经济复苏的“虚”与“实”。

① 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第15循環の景気の谷以後の状況について(概要)」,2017年6月15日、<http://www.esri.cao.go.jp/jp/stat/di/170615date.pdf>。

② 经济扩张时长处于前三位的时期分别是伊奘弥景气时期(2002年1月至2008年2月,历时73个月)、伊奘诺景气时期(1965年10月至1970年7月,历时57个月)、泡沫景气时期(1986年11月至1991年2月,历时51个月)。

## 一、日本经济的长期结构性困境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状态,经济增速显著降低,且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这是自 14—15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来未曾有过的低增长局面。<sup>①</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7 年和 2018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3.5% 和 3.6%,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分别为 2.0% 和 1.9%,虽然高于 2016 年的 1.7%,但仍然明显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sup>②</sup> 究其原因,短期看主要源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长期看,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层次结构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需求不足,但高企的政府债务和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水平限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二是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的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三是世界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这主要由人口结构变化、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过高、贸易收入弹性下降及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造成。<sup>③</sup>

2013 年,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演讲时重提 1930 年代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长期停滞论”。<sup>④</sup> 这一提法虽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但从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体陷入长期停滞并非毫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许多发达国家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投资疲软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等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长造成阻力。<sup>⑤</sup> 对于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的结构性经济难题,学术界进一步从全球化及制度根源等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当代资本主义

处于以金融全球化为主的全球化时代,在结构上对于长期停滞表现出敏感性,但由于全球化的两大特征即外生性刺激不足和内生性全球需求不足共同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低迷。<sup>⑥</sup> 这一现象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这一状况如不加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就是其必然宿命。<sup>⑦</sup>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为严峻。

### 1. 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加速。

2008 年日本人口达到 1.28 亿峰值,2011 年起持续下滑,2015 年降至 1.27 亿人。<sup>⑧</sup> 从长期看,人口减少趋势更加严峻,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测算,2020 年日本总人口将减至 1.25 亿,2053 年不足 1 亿人,2065 年仅为 8808 万

① 李晓、丁一兵《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载《东北亚论坛》2017 年第 4 期。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ly 2017,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7/07/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17>.

③ 朱民《世界经济:结构性持续低迷》,载《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1 期。

④ Lawrence H. Summers, IMF Fourteenth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in Honor of Stanley Fischer, November 8, 2013, <http://larrysummers.com/imf-fourteenth-annual-research-conference-in-honor-of-stanley-fischer/>.

⑤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ly 2017,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7/07/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17>.

⑥ 巴帕·帕特奈克《资本主义及其当前的危机》,马博、付筱娜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4 期。

⑦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常态化的困境——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自力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⑧ 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 <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index.htm>.

人,比2015年减少近1/3。<sup>①</sup>战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人口老龄化严重。1950年起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持续增加,2012年首次超过3000万人。伴随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5年)出生的人群步入老年行列,2042年老年人口将迎来3935万人的峰值。<sup>②</sup>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断提升,1950年为4.9%,2017年4月达到27.7%,居世界首位。2065年这一比率将升至38.4%,即每2.6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二是少子化加剧。截至2017年4月,日本15岁以下儿童年比减少17万人,仅为1571万人,从1982年起连续36年减少,人数创历史新低。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连续43年下滑,12.4%的占比不仅为日本的历史最低点,在世界各国也属最低。

三是劳动适龄人口持续减少。二战后,日本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稳步增加,1995年达到872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15年降至7728万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9.49%降至60.8%。

四是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战后日本的出生人口一直保持增加态势,1975年起这一状况开始反转,2016年出生人数仅为1975年的一半,死亡人数却增加81.8%。<sup>③</sup>人口减少及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给经济带来重大挑战,一方面是加重社会养老、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支出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劳动力短缺,拖累经济增长,无法保证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2. 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长期低迷。

潜在增长率是判断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指标。1980年代日本的平均潜在增长率超过4%,泡沫经济崩溃后开始下

降,全球金融危机后至今不足1%。2016年9月,日本政府修订了新的GDP统计测算方法,将研发、专利等投资计入GDP统计范畴,这一标准使日本2016财年的实际GDP增加31万亿日元,潜在增长率也从0.5%提升至0.9%。<sup>④</sup>

潜在增长率一般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三部分组成。根据经合组织统计,21世纪以来主要经济体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降低。泡沫经济崩溃后,伴随少子老龄化进程加剧,劳动适龄人口急剧减少,日本的劳动力要素对GDP的贡献度为负值,其局面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为严峻,日本经济面临需求减少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负面影响。

资本投入方面,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来消除“三过剩”(人员、设备、债务)困局。目前虽然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下贷款成本极低,但新增设备投资有限。而且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日本国内难以形成积极的经济增长预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

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值得关注。1980年代,日本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9%,在发达国家处于领先水平。经济泡沫破裂后,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将来推計人口・世代数」、<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Mainmenu.asp>。

② 截至2017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总务省统计局,2017年之后的预测数据来源于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

③ 厚生労働省「人口調査動態」、<http://www.mhlw.go.jp/toukei/list/81-1.html>。

④ 内閣府「月例経済報告」、<http://www5.cao.go.jp/keizai3/getsurei/getsurei-index.html>。

业主要注重国内市场的调整,未能及时回应国际需求,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骤降至0.7%。而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的IT产业蓬勃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1.6%和1.4%。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均呈现下滑趋势,日本0.5%的增速在主要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水平。<sup>①</sup>在劳动力和资本因素难以增长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实现创新及成果转化,将成为日本的重要课题。

### 3. 财政状况恶化,债务负担沉重。

在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公共债务高企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难题。1990年代后期,主要发达国家一方面将财政重建作为政治目标,另一方面赤字不减,债务规模依然呈增加趋势,其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尤为严峻,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50%,在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

一是老龄化急速发展需要大幅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医疗、看护、育儿等项目,在2017年的政府预算中,社保相关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3,而1990财年这一比例仅为17.5%。<sup>②</sup>社保费用一直是日本最大规模的财政支出项目,其财源由保险费、国家支出和资产性收入构成,占比分别约为60%、30%和10%,其中国家支出部分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1990年代至今,日本相关的保险费收入并未增加,但社保支出从1990财年的47万亿日元增加到2014财年的112万亿日元。

二是通过补充预算扩大财政支出。从1980年代后期起,日本几乎每年的决算规模均高于最初预算,这也导致下一个会计

年度的最初预算不断增加。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各种经济刺激政策扩大支出,但其增速基本保持在2%—3%,而日本通过补充预算导致支出增加4%—10%。<sup>③</sup>由于税收低迷,增加支出只能导致基础财政收支不断恶化。

三是日本租税负担率低。国民负担率是租税负担及社保负担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在考察政府财政情况时被广泛运用。由于社保费率提高,日本社保负担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而租税负担率(租税负担占GDP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2014年为31%,低于法、德、英等国。<sup>④</sup>一般来说,欧美国家主要依靠所得税、消费税等确保财源,而日本则力图提高社保费率来增加财政收入。在即将到来的超高龄社会,社保费率提升只能使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看护等服务的成本不断向下一代转嫁,而与此同时,日本较低的租税负担率无法确保充足的财政收入。长期看,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发展,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低下,今后将不得不继续依靠财政赤字。

## 二、“安倍经济学”的进程及举措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物价方面,日本从1999年至

① 厚生労働省「2017年版労働経済分析」,http://www.mhlw.go.jp/wp/hakusyo/roudou/17/dl/17-1.pdf, P72-75。

② 財務省「これからの日本のための財政を考える」,2017年4月,http://www.mof.go.jp/budget/fiscal\_condition/related\_data/201704\_00\_kanryaku.pdf。

③ 荻原真由美「米英独仏の補正予算制度」,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と情報」,No. 904,2016年3月23日,pp. 1-13。

④ 中田一良「日本の財政の現状と中長期的な課題」,季刊「政策・経営研究」,Vol. 3,2017, pp. 13-25。

2005年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陷入负增长,进入缓慢通缩过程。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降至-1.3%,此后持续下跌,再次进入通缩状态。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后,以“摆脱通缩”、“经济最优先”为口号,先后出台旧“三支箭”和新“三支箭”的政策组合,将其作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参见表1)。

从政策实施过程看,新“三支箭”既是旧“三支箭”政策接近极限时的新目标,也是对前期政策的强化,呈现出“六箭齐发”的态势。日本政府首先将政策重点放在了总需求上,期望通过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和物价,以此实现中长期经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超宽松非传统货币政策。

为使日本摆脱长期通缩,日本银行从1999年2月起便开始实施零利率等金融史上具有突破性的货币政策,2001年2月,在全球首次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E)。2013年1月,日本政府与日本银行共同发表声明,设定了物价年涨幅为2%的目标。2017年3月黑田东彦就任日本银行总裁后,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通过量化

质化政策(QQE)、负利率政策、长短期利率调控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大规模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

作为刺激总需求的政策,非传统货币政策成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一支利箭。从2013年初至今,日本银行大力实施扩张政策,这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日元贬值、股票上涨等。由于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非传统货币政策通过提升预期通胀率来降低实际利率,达到再通胀的效果,但长期持续的超低利率政策反而导致自然利率进一步下降,政策效果受限。同时,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升潜在增长率起到阻碍作用,长期低利率下充沛的资金供给降低了企业改善经营结构的意愿,不利于调整过剩供给和推动产业升级。从日本银行的政策演变来看,原本是短期作战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演变为长期持久战,日本银行的国债保有量急速增加,其政策风险和副作用愈发凸显。

2. 扩张性财政政策。

安倍第二次组阁后,启动了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并四次出台大型紧急经济对策,通过制定补充预算来扩大政府财政支出。2013年1月,安倍政府成立后立即制定了规模高达20.2万亿日元的“日本经

表1:旧“三支箭”与新“三支箭”的比较

		旧“三支箭”		新“三支箭”	
公布时间		2012年12月26日		2015年10月7日	
政策指向		摆脱长期通缩		构建一亿总活跃社会	
				具体目标	参考值
具体内容	第一支箭	大胆的货币政策	孕育希望的强有力经济	名义GDP: 600万亿日元	490.8万亿日元(2014财年)
	第二支箭	机动的财政政策	成就梦想的育儿支援	合计特殊出生率 (1位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数):1.8	1.42(2014年)
	第三支箭	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安心的社会保障	护理人员离职率:0	10.1万人/年 (2011年10月—2012年9月)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资料制作。

济再生紧急经济对策”,并通过2012财年的补充预算,将其中10.3万亿日元用于经济刺激对策,其规模仅次于2009年麻生内阁应对金融危机的紧急政策。其后,安倍政府制定了92.6万亿日元的2013财年政府预算,并将其与2012财年的补充预算合并使用,形成史无前例的长达15个月的政府预算。

税收方面,2014年4月,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升至8%后,两度推迟了将其最终升至10%的时间节点,目前计划于2019年10月实施新的消费税税率,比最初预计推迟三年。在老龄化进程中,财政重建无法有效通过增收实现,因此如何抑制支出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安倍政府不断推出大规模补充预算,不仅加剧了财政收支恶化,还对下年度的财政支出形成扩张压力,财政环境日趋严峻。

### 3. 经济增长战略。

作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第三支箭,2013年6月,安倍政府推出“日本再兴战略”,力图通过技术革新创造需求,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此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从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更替,各届政府也都推出了经济增长战略,而且近年来均以摆脱通缩、推动经济增长为重点。从经济目标来看,安倍政府沿袭了2010年菅直人领导的民主党政府的“新增长战略”以及2012年野田佳彦政府的“日本再生战略”,提出2020财年实现名义GDP增长3%、实际GDP增长2%。目前,安倍政府的“日本再兴战略”每年都进行修订或更新,截至2017年6月已持续5年。与以往的经济增长战略相比,此轮战略涉及范围更加广泛,涵盖企业创新、海外市场、国家战略特区、就业制度、人才培养、健康产业、基础设施、供应链、金融科技等内容,

但与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相比,其具体进展非常缓慢。

### 4. 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

2015年10月,安倍第三次组阁时提出“一亿总活跃”目标,将新“三支箭”指向日本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并于2016年6月通过“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sup>①</sup>(以下简称“总活跃计划”)。这项计划在强化新的第二支和第三支箭(即社保和人口)的基础上,力争实现经济与分配的良性循环。日本政府将总活跃计划视为广义经济政策,称之为“极致的增长战略”。总活跃计划测算了实现经济与分配良性循环机制的五项指标,即充实育儿支援、充实看护援助、促进老年人就业、改善非正规雇佣者待遇和提升最低工资。为了实现目标,日本政府首先将政策重点放在改革劳动方式上,力图实现同工同酬,纠正长时间劳动等工作模式,促进老年人就业。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二阶段,推进日本结构性改革的新“三支箭”以及总活跃计划成为安倍政府的主打政策,但其具体实施却困难重重。例如,每年至少需要2000亿日元的财源这一点无法得到保证,民间企业的经营模式、雇佣制度不易调整,等等。从日本经济的现实来看,这一宏大构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仅流于数字目标和政策愿景。

## 三、“安倍经济景气”的虚与实

2012年12月开始的复苏周期与安倍第二次组阁的时间重合,因此也被民间称

<sup>①</sup> 首相官邸「一億総活躍社会の実現」、2015年10月16日、<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ichioku-soukatsuyaku/index.html#plan>。

为“安倍经济景气”。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过程可以看出,日本此轮经济复苏主要倚重日本银行的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金融资本的“虚火”在短期内通过日元贬值、股票价格上升等渠道刺激总需求,使得企业收益增加,就业指标向好。但与高速增长时期的伊奘诺景气以及泡沫经济时期的景气相比,此次景气回升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低下,尤其是工资增长水平低,民间消费支出低迷,因此日本国民称其为“无实感”的景气扩张。

1. 在大规模宽松政策下,主要经济目标仍未实现,政策风险加大。

安倍上台后承诺了多项经济目标。例如2011财年至2020财年实现平均名义GDP增长3%、实际GDP增长2%;财政方面,分两次将消费税税率提升至10%,2015财年国家与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赤字占GDP的比重减少至2010财年(6.4%)的一半,至2020财年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实现财政重建;两年内实现2013年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等等。但从实际的经济运行结果看,却事与愿违,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以及中长期影响不容小视。

经济增长方面,安倍执政后,从2012年第四季度至2016财年末,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3%,甚至低于全球经济危机后经济处于严重低迷的民主党执政时期(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2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长1.8%)。从经济结构看,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疲软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财政方面,2014年4月日本政府如期实施5%至8%的增税措施后,经济下滑,2014年第二、三季度GDP转为负增长。2014年11月,安倍宣布将原本定于2015

年10月实施的将消费税税率升至10%的第二次增税推迟至2017年4月。伴随英国脱欧等因素导致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2016年6月,安倍再次宣布将增税计划的实施推迟至2019年10月。另一方面,安倍执政后继续扩大公共投资。这种财政收支结构在人口日益减少的现实下,将导致财政赤字更为恶化,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将更加遥远。据日本内阁府测算,即使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目标,2020财年财政收支仍将有8.2万亿日元的缺口。<sup>①</sup>

提升物价是安倍经济学最为响亮的口号,日本政府期待通过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摆脱长期通缩。事实上,日本银行持续推出多项政策实验,不断尝试货币政策创新,但2015财年和2016财年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分别仅为0%和-0.2%,截至2017年7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比增加0.5%,与2%的目标相距甚远。2017年7月,日本银行第七次宣布推迟物价目标实现的时间,从2018财年推迟至2019财年,<sup>②</sup>比最初计划推迟了五年。

日本银行大规模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是直接导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2017年5月末,日本银行的资产历史上首次突破500万亿日元,约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的2013年3月末的3倍,500.8万亿日元的总资产相当于日本GDP

① 内閣府「中長期の経済財政に関する試算」、2017年7月18日、<http://www5.cao.go.jp/keizai3/econome/h29chuuchouki7.pdf>。事实上,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经济无法大幅超过潜在增长率,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如期实现。因此,内閣府设定了两种情景,第二种情景按照目前的潜在增长率计算,即名义GDP为1%,实际GDP不足1%,在这种情况下,2020财年赤字将达10.7万亿日元。

② 日本銀行「経済・物価情勢の展望」、2017年7月、<http://www.boj.or.jp/mopo/outlook/gor1707b.pdf>。

的93% , 远超美联储的23%和欧洲央行的28%。此外,日本银行的国债保有规模以及保有比率屡创新高,2017年6月末达437万亿日元,占国债发行总量的40.3%。与此同时,从2012年12月末起,银行保有国债余额连续19个季度负增长,2017年6月末仅为197万亿日元,占比18.2%,均跌破历史记录。日本央行如此大规模购买国债的行动不仅降低了国债的流动性,而且将迎来政策极限,陷入金融市场无债可购的局面。<sup>①</sup>

可以看出,安倍执政后继续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力图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刺激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多次推迟实现政策目标的时间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国民及金融市场对经济、金融政策失去信任,同时对未来经济预期产生悲观情绪。为调整经济预期,安倍政府以实现经济目标为由,继续加大政策力度,将短期的非常规刺激政策向长期化、常态化延伸,这使得经济风险加大。伴随基础货币余额的增加,国债收益率降低,日本银行以较高价格购买大量国债,这将增大国债期满后的偿债负担,导致日本央行财务恶化、信誉受损,并可能增加国民负担。加之近年来美欧各国稳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日美利差加大,国债利率面临上升压力。若利率攀升,日本银行的债务负担将加重,与此同时,政府国债的利息费用也将随之高企,财政赤字的状况将更加严峻。

2. 近年来就业指标好转,但非正式就业现象突出。

近年来,日本的就业形势持续改善,2016年平均完全失业率为3.1%,创1994年以来新低,并连续6年下降。反映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情况的有效求人倍率连续8年上升,从2010年的0.47倍升至

2016年的1.36倍。2017年7月,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为2.8%,有效求人倍率高达1.52倍,创1974年2月以来的新高。

就业指标好转一直是安倍政府标榜的业绩,但事实上,这并非“安倍经济学”的贡献。由于人口减少,从民主党政府开始,失业率便企稳向好,2009年第三季度日本失业人口达到359万人的峰值,之后连续8年呈减少趋势。2010年4月日本有效求人倍率提升,2010年6月完全失业率为5.2%稳步下降。此轮景气中,虽然就业数据好于泡沫经济景气,但出现了几点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一是劳动供给能力低下,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如前文所述,1995年日本劳动适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20余年持续下降。2012年,团块时代<sup>②</sup>出生的人口达到65岁,开始步入老年人行列,劳动力人口的降幅进一步加大。日本银行的调查显示,全规模全产业雇佣人员判断指标(DI)为-25,<sup>③</sup>是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首次出现负值,这显示出就业市场人手不足的状况。人手不足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非均衡状态,在人口缩减的背景下,劳动供给能力低下成为主要问题。

二是劳动时间较短的非正式就业人口增加。从2013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日本就业人口合计增加245万人,其中正式就业人口97万人,非正式就业人口

<sup>①</sup> Serkan Arslanalp and Dennis Botman, “Portfolio Rebalancing in Japan: Constrai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Quantitative Easing”, IMF Working Paper, WP/15/186, 2015.

<sup>②</sup> 指1947年至1949年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一代,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力。

<sup>③</sup> 日本銀行「第173回全国企業短期經濟観測調査」、2017年6月、<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tk/yoshi/tk1706.htm/>。



高达144万人。非正式就业人口的占比从2012年的35.2%上升至2016年的37.5%<sup>①</sup>，同时，非正式就业人口的实际劳动时间呈减少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和2009年分别缩减2%和1.5%。在安倍执政期间，自2012财年起，非正式人口的就业时间连续5年减少，2017年7月仍减少0.5%。<sup>②</sup>从非正式就业人口的结构看，主要以为改善生活而不得不牺牲闲暇时间的65岁以上老人和主妇为主，其中65岁以上老人占非正式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的9.3%增至2016年的14.9%，这种现象与社保和年金制度不完善以及非正式员工的工资水平低直接相关。<sup>③</sup>由于有效求人倍率包含短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就业形式，因此仅从统计数据看，该指标连创新高。但是，根据“劳动投入量=就业人数×劳动时间”这一计算公式，即使就业人数提高，但劳动时间缩短，因而从总体上作为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仍然非常有限。

3. 企业收益创新高，但工资增长停滞，劳动贫困层增加。

从2012财年开始，日本企业的收益持续增加，2016财年经常收益年比增长9.9%，其中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分别增长3.1%和13.5%，全产业以74.99万亿日元创1960财年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收益水平。<sup>④</sup>带来高收益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大型企业的海外收益增加；二是安倍经济学带动日元贬值，大型出口企业的效益大增；三是销售、管理等成本费用低；四是人工费用降低；五是制造业的业绩有改善。<sup>⑤</sup>其中，高收益下对人工费即工资的抑制成为国民认为增长“无实感”的关键所在。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反映劳动者人工成本的劳动分配率出现持续下降。2017年第二季度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的劳动分配率仅为43.5%，为高速增长时期的1971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下的中坚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劳动分配率为69.8%，为1992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值。

二是企业内部留存不断增加。泡沫经济崩溃后，特别损失占企业销售总额的比重激增，日本企业通过减少负债压低成本，2000年代中期内部留存规模持续增加。一般来说，企业留存主要用于投资或研发，以促进收益作为增加员工福利的资本，但由于企业对未来的前景缺乏明确信心，设备投资行为谨慎。2016财年，企业留存收益年比增加7.5%，达406.23万亿日元，连创新高，但设备投资仅微弱增长0.7%。

三是工资增长停滞。泡沫经济崩溃后，在企业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1997年起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在安倍政权下，2013年至2015年日本的实际工资连续负增长，其中由于提高消费税，2014年工资增长率更是大幅降至-3%。2016财年虽然实际工资以0.4%的升幅实现时隔六年的增长局面，但实际上从2016年10月起，

① 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2017年5月、[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rireki/4hanki/dt/pdf/2017\\_1.pdf](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rireki/4hanki/dt/pdf/2017_1.pdf)。

② 厚生労働省「毎月勤労統計調査」、<http://www.mhlw.go.jp/toukei/list/30-1a.html>。

③ 伍賀一道「「人手不足」下の雇用と働き方の貧困」、『経済』2017年9月、pp.26-37。

④ 財務省「法人企業統計2016年度」、<http://www.mof.go.jp/pri/reference/ssc/results/h28.pdf>。

⑤ 小栗崇資「大企業の「減収・最高益」の秘密」、『経済』、2017年8月、pp.75-80。

月度实际工资增长率便陷入停滞或负增长,进入2017年后持续下滑,2017年7月降至-0.8%。从名义工资看,1997年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税率从3%提高到5%,加之经济泡沫破裂的影响,日本平均名义工资持续下滑,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跌,2014年起开始微弱回升,但增幅缓慢,2017年第二季度增长率仅为0.5%。

四是劳动贫困层增加。工资降低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2012财年日本家庭的消费支出年比增长2.2%,2016财年降至-1.4%,连续3年负增长。抑制工资增长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是贫富分化。一方面是劳动贫困层(working poor)增加。日本一般将每年工作报酬低于200万日元的人群定义为劳动贫困层,2016年劳动贫困层为1132.3万人,年比增加1.5万人,连续四年超过1100万人。另一方面是工资差距加大。2016年,年收入2500万日元的最富裕阶层的人数为12万人,连续两年增加。<sup>①</sup>安倍2012年末执政以来,随着工资水平低下的非正式就业人员的增加,贫困层人数大幅增加,以平均年收入来看,正式雇佣员工为486.9万日元,而非正式雇佣员工只有172.1万日元,工资差距连续四年呈扩大趋势。

目前,兼职、临时工等非正式就业岗位的工资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势头,但由于名义工资具有向下刚性,基础工资上涨后很难在经济形势低迷时下调,因此正式员工的整体工资水平变化微弱。在日本的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现实下,出于对老年生活的忧虑,无论以老人和主妇为主的非正式就业大军,还是苦恼于工资水平低下的正式员工,都将继续选择节约模式,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安倍经济景气”的繁荣是在超宽松非传统货币政策及大规模经济刺激对策的强力推动下实现的,其背后是日益严峻的中长期风险及社会问题,这些风险主要源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普遍存在的长期结构性难题。目前,“安倍经济学”已实施四年多,但其主要的经济、金融指标仍未实现,而且随着以刺激短期总需求为目标的宏观政策演变为持久战,其政策风险将逐步扩散。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劳动人口减少、设备投资低迷、创新技术亟需突破的背景下,日本与欧美等国大规模实施非传统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资本的虚火在短期内刺激了景气回升,但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长期存在的根本问题,国民称其为“无实感”的景气扩张。在愈发严峻的少子老龄化进程中,面对日本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的长期困境,安倍一直高举“经济优先”的旗号,但其志向在于实现扩军、修宪等政治野心。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下,以确保大企业利益为中心的“安倍经济学”实施已近5年,其政策效果已经接近极限。如果日本政府不改变现有的政策思路,扎扎实实地推进规制改革及结构调整,日本新一轮经济复苏就更多地可能是一种幻象。■

[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 周艳辉)

<sup>①</sup> 国税庁「2016年民間給与実態統計調査」、<http://www.nta.go.jp/kohyo/press/press/2017/minkan/index.htm>。